

中华大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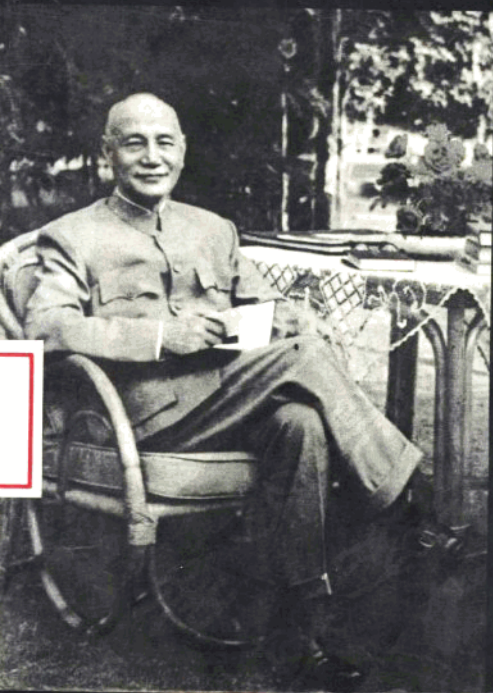
ZHONGHUADAZHIHUI

3

● 圣人 ● 圣书



蒋介石自称他“把王阳明当作导师崇拜”，“最喜欢读王阳明的《传习录》”，并将阳明心学作为其“终生的精神食粮”。



# 传习录

● 蒋介石终生最喜爱的书

白照注译  
文对新新  
王阳明

明

李贤民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 中华大智慧 3

## 传习录

李贤民 注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172号

中华大智慧 3

传习录

李贤民 注译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河南省郑州市中州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3.5印张 6插页 1295千字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300册

\*

ISBN 7-5059-2340-4/I·1710 (全三册)定价: 68.00元

# 开启东方智慧之门

——《中华大智慧》卷首语

人类又一次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

21 世纪的生存与发展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早在 1988 年，75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 2500 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更多的人则预言 21 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华智慧必将而且正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这里所说中华智慧乃指“大智慧”，即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伦理道德精神，包涵人性修养、社会伦常和天道自然观。而纵观几千年儒家文化的流变，堪称中华大智慧精华代表的，则是孔子、朱熹、王阳明三大圣人和他们的著作《论语》、《近思录》（含《续近思录》）、《传习录》三大圣书，是谓千秋相续、尊崇不移的圣学心法。孔子被奉作千古至圣、万世师表，成为传统社会的精神偶像，其语录《论语》则作为东方人的圣经。值得注意的是，《论语》所体现的儒学精神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显示了奇迹，被奉为日本工商业界的“圣经”；日本近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1840—1931 年）著《论语加算盘》，提倡道德经济合一论，成为企业家们的必读书；而以“三神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集团主义）为核心，以家族式公司命运共同体为基本模式的日本式经营所贯穿的正是儒家伦理精神。朱熹是新儒学——理学的集大成者，上继儒家绝续千年之道统，是宋代以后八百年间儒学传统的最权威的解释者，不仅为包括朱元璋、康熙在内的历朝

统治者所顶礼膜拜，而且他所集注的《四书》等著作也成了科举的准绳；同时其影响遍及整个东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熹的世界观是前现代化时代东方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由他所辑录的《近思录》和清代大儒张伯行辑注的《续近思录》则系统辑录了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的语录，体现了新儒学——理学的全部文化内涵，因而被尊为“六经之阶梯”、“圣学之津梁”，成为近八百年来儒学的入门书，近代大家曾国藩甚至以此为日课，终生研读，力行不辍。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一生武功赫赫，学名昭昭，在朱学衰颓之际，倡导心学，高扬人性，把儒家的内圣之道发展到了极致，至王门后学更带上了明显的近代色彩。其代表作《传习录》更是享誉中外，影响了一代代中、日政治人物和思想家，阳明学在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腾飞期的台湾、韩国都被作为精神的源泉和动力。三大圣人、三大圣书的有机联系和不断完善，构成了儒家伦理道德精神的核心，我们称之为中华大智慧。

不可否认，儒家伦理的某些具体内容或历史形态会随时代发展而被淘汰，但是其基本的精神则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永恒的价值，是中华民族甚至包括东方各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点。如“仁”的个性修养、“人皆可为圣人”的道德自我觉醒、“心即理”和致良知的人文主义倾向；“礼”的社会伦理纲常，充盈着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伦理道德实践、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庄严而崇高的理想人格使命；以及内蕴着超越的道德精神境界等等。所有这些既在社会整体层面上和个人生活层面上对现代社会提供了精神的原动力，而且对于平衡和稳定现代化进程中的秩序和规范，和谐人际关系，维系敬业乐群的社会共同体，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华智慧的这种现代价值早已为亚洲四小龙腾飞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并且必将在21世纪的世界发展中再造辉煌。遗憾的是，沐

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中华大智慧的现代诠释和励行践履还远远不够，从这个角度来重新认识三大圣人、解读三大圣书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我们正是以这样的心情，推出这套《中华大智慧》，愿为世纪之交的人类打开东方智慧的大门。

我们期待着，我们热望着！

## 序

这是一个孕育着历史的变革，呼唤着巨人、圣人而且出现了巨人、圣人的时代！

在西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文化艺术的天空巨星闪烁，社会历史正在向资本主义的门槛跨越……

惊人相似的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新时代的曙光也在此时微露于遥远的天际。上继孔圣人规天范地、师表万世之道统，朱圣人集理学大成，唯我独尊、如日中天几百年后，无可奈何地没落了。与商品经济的潮流、思想解放的呼声、人文精神的昂扬相一致，王阳明“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集心学之大成，崛起而起，“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成为一代圣人，其心学代表作《传习录》也成为中外人士传读修习的圣书。当然，“圣人”之谓，乃是后人所加，阳明心学的核心之一就是认为人们只要将自己内心的“良知”体认明白，就可达“圣人气象”，也就是说“圣人”与“愚夫愚妇”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进而言之，“人人皆可为尧舜”。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为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其祖上世代书香，父王华，字德辉，成化十七年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

明生当明代中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崩颓之际，这样的历史环境给以天下为己任的他提供了施智展才的机遇，使他得以其辉煌的事功和杰出的学说，“文事武备”，成为“儒家第一流人物”，成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并对中外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

王阳明一生事功赫赫，封伯赠侯，超然入圣，学名昭昭，而其学术与事功的发展脉络大体相应，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里，就让我们首先循着他的生活轨迹来缕述一下他的生平及功业。

据文献记载，王阳明生有异质，卓然不凡。在他诞生之前，祖母梦见天神衣绯玉云，抱一赤子，从空而来，祖父遂为他取名“云”，并名其居为“瑞云楼”。出生后，5岁尚不能言，但已默记祖父所读过的书。有一高僧过其家，摸着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祖父根据《论语·卫灵公》：“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改名为“守仁”，随后他就能说话了。11岁时随父进京，次年开始就读，以“学圣贤”作为自己的理想，而视科举为次。15岁出游居庸、山海关，纵观山川形胜，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当时他性格机智，豪迈不羁，常与同伴演习攻战为戏，且已精于骑射，十分向往东汉大将马援的功业。出游归来后，有感于矛盾丛集、动乱频仍的社会现实，他屡欲上书朝廷，都被其父斥为狂妄乃罢。17岁时，到洪都（今南昌）迎娶诸氏为妻，后偕夫人归余姚，在父亲的严督下学习经义，准备科举考试，日则随众课业，夜则浏览子史，学业大进。21岁在浙江乡试中举，接着两次会试均落第而归，当时蒙古小王子内犯，边事甚急，王阳明于是留心武事，精究兵家秘书，每逢筵宴，喜欢谈兵论剑，甚至聚果核列阵为戏。这些早年的经历和修习，都为其后来的作为打下了基础。

弘治十二年（1499年），28岁的王阳明得中二甲进士，观政工部。次年上《陈言边务疏》，提出了一套切中时弊的军事思想。当年授刑部主事，接着奉命审录江北囚狱。不久告病归乡，游九华山，又筑室于绍兴阳明洞中，行神仙引导之术，后以不得正道而罢，到西湖养病。弘治十七年主持山东乡试，是年又改任兵部武选司主事，次年，王阳明开始授徒讲学，有倡明圣学之志。

正德元年（1506年），35岁的王阳明以其“直节”遭受了政治生涯中第一次沉重的打击。当时，年仅15岁的荒唐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奸宦刘瑾专权，朝政日非。大学士刘健等联名上疏请罢刘瑾，却被刘瑾矫诏罢免；给事中戴铣等人上疏切谏，也被迫害下狱。王阳明抗疏救之，请皇帝“宥言官，去权奸”，结果被廷杖四十，逮系诏狱，不久被贬谪贵州龙场驿驿丞。龙场位于今贵阳西北修文县境内，处万山丛棘之中，蛇虺成堆，瘴疠流行，当地居民多为苗、彝等族，语言不通，原始落后。龙场驿也仅有“驿丞一员，吏一名，马二十三匹，铺陈二十三副。”谪居生活是相当艰辛的，不仅水土不服，环境恶劣，还须种田、采蕨、砍柴、灌园、烧水做饭，同时还有奸宦刘瑾的走卒（如巡抚王质等）的迫害凌辱。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王阳明发挥其主观精神，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得以内外合一，胸中洒落，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入于心学之门。不久在此设立龙冈书院，授徒讲学，声名远播，后又受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聘，讲学于府城文明书院，从学者日众。至正德五年贬谪期满，迁江西庐陵知县，不久升南京刑部主事，次年又改任北京吏部主事，屡迁吏部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少卿、南京鸿胪寺卿等职，正德十一年（1516年）以兵部尚书王琼推荐擢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从此开始了他一生靖难平乱的辉煌功业。

巡抚南赣：当时的江西南部 and 福建汀州、漳州以及广东、湖广边境一带是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活跃的地区，所谓的“巨寇”此起彼伏，自封王侯，攻略府县，直接威胁着明朝政权的统治。王阳明到任后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创行十家牌法，编十家为一牌，列出籍贯、姓名、年龄、形貌、职业，每天由一家按牌巡察，遇有可疑者当即报官，隐匿不报者十家连坐。疏请给予旗牌，提督军务，便宜行事，改革兵制，二十五人为伍，伍有小甲，二伍为队，队有总甲，四伍为哨，哨有哨长，二哨为营，营有营官，三营为阵，阵有裨将，二阵为军，军有副将，临事委任，递相罚治。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广毗邻地区编练民兵，作为地方武装，专以守城防隘为事，配合官军作战。在此基础上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或轻兵智取，或重兵围剿，或晓义招抚，陆续将该地区的大小农民暴动一一平定。然后在要害地区设置了福建平和县、江西崇义县、广东和平县等，加强行政统治，进而订立乡约，建立学校，移风易俗，改革盐法，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思想统治，从而一改长期存在的动乱局面，“远近惊为神”，他本人也因功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予世袭锦衣卫百户，再进副千户。

平定宸濠之乱：正德十四年，继南赣告捷之后，王阳明又受命勘处福建叛军。行至丰城，得知宁王朱宸濠谋反，急趋吉安，征调兵粮，号召义勇，准备平叛，并上疏告变，传檄各地，起兵勤王。宁王反叛后，下九江，趋安庆，窥伺南京，王阳明利用宁王后方空虚之机，置安庆之围于不顾，毅然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率八万精兵直捣南昌。宁王回师救援，双方激战于鄱阳湖地区，最后利用火攻，大败叛军，生擒宁王朱宸濠并其世子、郡主、将军以及伪太师、国师、元帅、参赞、尚书、都督等官，进而收复南康、九江等所有失地，一场震惊朝野的大叛

乱仅用 35 天（一说 43 天）就彻底平定了，充分表现了王阳明的智谋与勇略。

出征广西：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有功社稷，不仅未获封赏，反而招致了一场灾祸。荒唐天子明武宗早想南巡游乐，得到宁王叛乱的报告后，遂自封威武大将军领兵亲征，命太监张永、张忠、许泰都督军事，借机南巡。行至良乡，捷报传来，武宗仍不听劝谏，继续南下，张忠、许泰甚至追索宁王，欲纵之鄱阳湖，等武宗与之交战后再纪功，王阳明恐为害地方，不从，连夜赴钱塘将宁王交给张永。结果招致张忠、许泰的百般陷害，甚至诬之为宁王同党，“谗邪拘煇，祸变叵测”。不久武宗卒，世宗即位，任南京兵部尚书，后封新建伯。当年上书乞归，回到故乡，次年其父病逝，服丧尽孝，自此直到嘉靖六年（1527 年），他一直在家聚徒讲学，总结反思自己的人生遗迹，发挥心学，超狂入圣，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嘉靖六年五月，朝廷诏王阳明以原职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平定广西思恩、田州之乱。先是，思恩土官岑濬、田州土官岑猛相攻，被官军平定，改设流官统治。岑猛旧部卢苏、王受不服流官统治，聚众起事，并借交趾兵二十万，攻陷田州、思恩府，提督两广军务的姚镛用兵无功，廷议决定起用王阳明总督两广兼巡抚，“复征”思恩府和田州。王阳明赴广西途中，即上疏认为流官之设，徒有虚名而无益于事，应当仍用土官统治，未获准。到任后与巡按御史石金合议，采取攻心为上的招抚之策，遣散诸军，只留土兵数千，“解甲休息”。卢苏、王受感其诚意，主动请降，思、田之乱不战而平。王阳明奏闻于朝，陈用兵十害，招抚十善，请复设流官，析田州别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署州事，下置十九巡检司，以卢苏、王受等任之，均受约束于流官知府。同时在当地建立学校，兴办

书院，加强文治。至此，王阳明本可以班师凯旋，但他看到断藤峡、八寨的瑶僮诸族暴乱“其可忧危，奚啻十百于二酋者之为患”，于是不待诏令，出其不意，移师突袭围剿，使这个“根株渊藪”百余年来连绵不断的暴动一举荡平，西南边区得以安宁。这年（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其肺病再度加剧，遂上疏告归，十一月二十九日，归途中卒于江西南安。隆庆中，诏赠新建侯，谥文成，予世袭伯爵，万历中，又诏从祀于文庙。

“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其一生功业可谓赫赫，然而，正如他在正德十三年致友人信中所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窃，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在其仕途坎坷、戎马倥偬的一生中，主要精力还是致力于究心致知之学，透悟圣人之道，聚徒讲学，阐发心学，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思想（阳明学）体系。

根据黄宗羲《明儒学案》的说法，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动态发展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始则泛滥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久之，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学成之后，又经过诚意为学宗、专主致良知、超狂成圣人三变，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

泛滥词章：王阳明自幼聪异，涉猎广博，擅长诗赋文章。早在11岁赴京途经金山寺时即对客赋诗二首：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后来在父亲的督导下学习经义，博览经史子集，词章功夫大进。22岁会试落第后，回乡与魏瀚等结诗社，对奕联诗。28岁进士及第后，与当时文坛巨子李梦阳、何景明等交游，仿古诗文颇享令誉。由于专心词章，遍读文献，以致31岁时便积劳成疾，于是他叹道：“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从此淡于词章，而有志于心性之学。虽然如此，其诗文风格超逸，成就不凡，只是为其赫赫事功、心学成就所掩，少为人知罢了。

笃信朱学：王阳明早年就立志“读书学圣贤”，18岁赴江西成婚归来途中，拜谒明初大儒吴与弼的弟子娄琰，“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遂深契之”。中举后便遍求朱子之书读之，端坐省言，以仿圣人气象。一天，根据朱子所说一草一木皆至理，便以父亲官署中的竹子为对象，冥思苦想，以穷格竹子的道理，到第七天便支撑不住了。27岁时读朱子“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于是感悔以前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改而循序以格物，收效颇好。但总感到物理吾心，终若判然为二，无法契合。沉郁久思，旧病复作，深感自己没有圣贤的天分，消沉之余，转而入于佛老，从而与朱学分道扬镳。

出入佛老：王阳明赴江西完婚之时，就曾入道教铁柱宫，叩问养生之道，学习导引之术，与道士对坐忘归。至笃信朱学，格物穷理而致得病，回到家乡休养，又对道教产生浓厚兴趣，“遂有遗世入山之意”。做官后奉命审录江北囚狱，游九华山、无相寺、化城寺。归越后筑室阳明洞，静坐修炼，后又游西湖诸寺院，接触了禅宗切身顿悟的思想方法，但又依恋亲情，反对佛教出世败伦的主张。34岁时，始悟“缪矣三十年”，这一年他与

陈献章的弟子湛若水一见定交，遂摒弃佛老之学，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归宗儒学：龙场顿悟是王阳明学术思想的转折点。时在正德三年（1508年），他“居夷处困”，日夜端坐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落，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矣，并以此说与五经相印证，莫不吻合，于是写下《五经臆说》。至此以“求理于吾心”否定了朱子格物以穷理的认识论，长期以来困扰着他的物理与吾心判然为二的疑团终于释然，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心学基点。

王阳明 37 岁之后思想发展又经过了三次飞跃。首先是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他发明《大学》古本的宗旨，主张“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教学者诚意息虑、默坐澄心，“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即格物），以达到知行合一。其次是在平定宁王之乱前后提出的致良知之教。主张“致知者，诚意之本；格物者，致知之实”。“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最后是超狂入圣，主张要成圣，首先要成为狂者，然后才能悟道而入圣。他收狂放任侠、放荡无羁的王畿为弟子，颇能体现这一思想。嘉靖三年王阳明讲学会稽稽山书院，从者三百余人。八月中秋，月白风清之夜，在天泉桥宴请门人，参加者百余人，酒至半酣，或歌唱，或投壶，或击鼓，或泛舟，兴致盎然，王阳明当即赋诗《月夜二首·与诸生歌于天泉桥》：

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撓？

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

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颇有些狂放不羁，任情恣意。至嘉靖六年出征广西前夕，又应大弟子钱德洪、王畿所请，在天泉桥阐发了“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为学宗旨，并肯定了王畿所言“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这就是所谓的“四句教”和“四无说”，表明了阳明学的基本思想和内在境界，史称“天泉证道”。

在对王阳明学术思想作过一番动态的纵向描述之后，我们再来对其基本内涵作以简单概括，进而分析其进步涵义和深远影响。

阳明心学是从朱子学中脱胎而来并走向对立面、进一步发扬南宋陆九渊的心学精神、以《大学》为框架并随着其本人生存体验的不断深化逐步建构起来的。其基本内容包括三个主要部分：一是心理的人性论，一是知行合一的认识论，一是致良知的修养学说。

心者，天地万物之主，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这是阳明心学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人为天地之心、万物之主，而人心“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而“圣人之学，心学也”。圣学便是圣人为了复原其心体所共同的与万物为一体的本心，从而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来教化世人。因此他进一步提出“心即理也”，“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而心意之所体现，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就是说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如果没有主体意识的参与，一切社会实践活动就无法进行，这就是所谓的“心外无物（事）”的内涵。

针对当时社会上言行不一的现实以及朱子知先行后说的弊端，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之说。他认为知和行原本说是一个功夫，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知。总之，知行功夫本不可离，有知方有行，有行便有知，而知行的本体只有一个，那便是良知良能，而知行的功夫也只是个，那便是致良知。

致良知是王阳明从百死千难中体贴出来的“灵丹一粒”、“正法眼藏”。这是《大学》“致知”和《孟子》“良知”的结合，堪称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环节，他自以为是“千古圣贤相传的一点真骨血”。良知便是天理之昭然明觉，良知便是天理，天理不外乎是仁义礼智、忠孝悌信等五伦百行的道德规范，而致良知便是通过主体的自我道德修养，从而合乎天理，体认良知。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见到父亲自然知孝，见到兄长自然知悌，见到孺子入井自然知侧隐，此便是良知”。如果说前述之“王门四句教”是阳明学说的中心，那么致良知就是中心之中心，而“四无说”则是超狂入圣功夫的极致，而致良知就是通过为圣的功夫即内在的道德重建，使其回复到明洁的、无善无恶的本心，回复到那个超越现实的自由之境。这一致良知统合了《大学》的格物、诚意、正心，其最高境界便是圣人，而良知原本人人固有，因而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把人的主观精神提高到空前的高度，构筑起自己的心学体系。

阳明心学是作为萎靡消沉、一潭死水的程朱理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尽管主观上是为了挽救儒学的颓势，重振理学精神，但却与当时知识阶层自我意识觉醒、厌常喜新、追求自由的心态律动相应合，与晚明呼唤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相一致，因此王阳明登高一呼，在当时僵化沉寂的学术界确实起到了震聋发

聩的作用，海内耸动，趋者若鹜，成为晚明学术的主流。著名文学家袁宏道说：“至近代王文成、罗盱江辈出，始能抉古圣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竿，系文武铎，以号叫一时之聋聩。”其弟袁中道也说：“自东越揭良知，以开天下学者，若披云见日矣。”史学家兼文学家的张岱也说：“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则形容：“可谓雷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可见其对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局面、促进解放思想和社会觉醒的巨大作用。

阳明心学的积极的社会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是他高扬主体精神，突出意识的能动性，把“心”作为万物之主，天地鬼神的主宰，不仅有助于破除思想迷信，打破程朱一统天下的沉寂局面，以充满活力的心来医治儒林的麻木和迂腐，进而成为晚明思想解放的催化剂。其次，从“心外无理”论出发，认为学贵得之于心，不以孔孟的是非为是非，通过“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这一环节，否定圣贤经典的绝对权威，进而走向冲击“圣贤经传”的境地。再次，阳明心学把玄妙而不可及的天理移到人们的心中，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即可致“良知”即天理，简捷明快，反对烦琐哲学，因而更接近于世俗；尤其是将圣人的概念通俗化，只要将自己内心固有的良知体认明白，即可达到圣贤气象，愚夫愚妇与圣人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因而人人皆可为尧舜，“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并不足怪。这对呼唤主体意识的觉醒、新的社会思潮的启蒙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复次，阳明心学追求透明本心、胸中洒落、超狂入圣，充满生机和活力，其精神境界何等难得！王阳明任南京太仆少卿、督滁州马政之时，地僻官闲，日与门人游山水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震山谷。又如嘉靖三年八月中秋之夜，他与弟子百余人宴饮天泉桥，酒至半酣，狂歌曼舞，击鼓泛舟，仰